

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

——基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分析

张 晗 赵 磊

[摘要] 共建“一带一路”十多年来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共建国家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促进了共建国家在政治上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基于钱学森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剖析经济系统、外交系统及二者之间系统耦合的运作机制,有利于夯实“一带一路”的学理支撑。结合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了经济外交的系统耦合,涵盖系统内耦合和系统间耦合。其中,非线性传导机制下,经济合作产生的连锁反应推动了外交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正反馈机制下,外交行为增强了经济合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适应与演化机制下,共建“一带一路”逐步构建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系统生态,推动形成国家间互相协同、自发合作的自组织结构。未来,仍需以统筹推进、协同发展的理念深化经济外交的系统内耦合和系统间耦合,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论;开放复杂巨系统;系统耦合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5.02.003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5)02-0045-(16)

[收稿日期] 2024-1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22VRC047)

[作者简介] 张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91)

“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①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务实合作打破了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的地理屏障,推动了基础设施、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广泛合作,为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与共建国家的互联互通,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带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一带

^① 原文参见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3-10.

一路”推动着共建国家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双轮并驱、协同共进,又在系统耦合机制下形成了良性循环的经济外交系统,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并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实践,并且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既是对外开放也是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提升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效率,促进了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实现。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促进贸易便利化、提升产能合作、深化金融创新等,共建国家提升了跨境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率和时间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1][2]}例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而且能够有效促进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文化、制度的交流互鉴又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3]同样,“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改变了西方主导的能源格局,形成了网络化的能源合作多边模式,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进口与出口方面形成平衡的能源关系,同时帮助共建国家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4][5]}

另一方面,经济合作增强了共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通过外交渠道强化了彼此的政治互信。^[6]通过高层对话以及双边和多边会谈等外交手段,经济合作推动了外交上的协作和政治信任的建立,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诸多共识。中亚作为中国的近邻,将各国战略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加强了经贸、投资、能源、交通、农业等传统领域和规则、制度、标准等“软联通”领域合作,并通过元首外交凝聚共识,在双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上给予相互支持。^[7]东南亚国家认为,“一带一路”通过解决基础设施短缺问题,夯实区域间的连通性基础,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联系,释放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加速工业化进程。^[8]在非洲地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埃及等国家通过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经济活动、出席多边会议等外交活动,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9]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治理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模式,从而形成一条新型全球化道路,涵盖包容性基础设施、包容性增长、包容性文化等领域。^[10]

共建“一带一路”具有经济和外交的双重功能,并且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经济上的合作共赢为政治共识提供了经济基础,外交上的互动协调也反过来推动经济合作的深化。这种经济和外交的双向互动,使得“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认可和支持,甚至成为一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动力源。

在既有的学科分类和理论体系下,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分别从各自视角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理论阐释。由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阐释其理论价值。林毅夫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发展合作框架,基于中国经验和综合实力,将基础设施作为优先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经济增长瓶颈,为共建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1]以东欧国家为例,虽然这些国家已加入欧盟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依托广阔的内部市场,但由于缺乏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未能完成工业化,进而难以在欧盟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欧国家长期

处于经济恢复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2]

与发展经济学视角相呼应,共建“一带一路”被视作对全球生产网络的重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全球价值链模式逐渐取代传统的“本国生产、全球销售”的生产贸易模式。^[13]共建“一带一路”强化了全球价值链模式,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嵌入其中,通过对能源、矿产、土地等优势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14]这种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不仅助力发展中国家发挥各自互补性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而且弥补了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公共产品的长期缺失,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同样受益。^[15]因此,诸多学者认为,“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但其核心意义在于通过新型发展合作来创造经济发展条件,进而促进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背后的地缘政治动机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将以“一带一路”倡议挑战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美国的主导地位,随之成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力量。^[16]在权力转移理论的叙事下,“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作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竞争的手段之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网络来展现其经济影响力,进而塑造出“条条大路通北京”的国际格局。^[17]

也有学者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实践突破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既有理论体系,体现了一种地缘政治理论的创新。^[18]“一带一路”被视为强调互联互通的新型地缘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原因在于“一带一路”主张“共商”而非单方面的权力控制,“共建”而非对立的零和博弈,“共享”而非大国中心主义。这种创新还体现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塑了“地理—经济”分工的空间格局,精准定位和有效修正了长期以来海陆国家的空间矛盾,进而创造了新的经济地理,有效推动分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产地理的优化更新。^[19]

既有理论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受各自学科视角的局限,现有研究仍然欠缺“经济—外交”的整体性视角。这无法展现“一带一路”作为经济外交顶层设计的战略定位,也难以体现出“一带一路”取得历史性成就背后经济外交活动的全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不仅需要务实合作,也需要学理支撑。钱学森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立足本土的自主知识体系,但是在经济外交研究中尚少见运用。基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能够看到经济外交活动中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运行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连接经济学与政治学、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的理论体系。为此,本文将基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分析“一带一路”经济系统、外交系统及其系统耦合机制,以推动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统筹推进、协同发展。

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回顾

系统论是系统科学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无数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所形成的统一整体。系统就是由许多部分所组成的整体,而整体是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组织。^[20]经济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双重支撑,并在二者的交互

作用中体现出政策的整体有效性。

(一) 系统论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

系统论源于生物学,最早由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是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整体。贝塔朗菲对这种普遍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现象概括总结,提出了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认为系统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系统方法需要遵循四项原则:一是整体性原则,即把握客观世界的整体性,且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二是相互联系原则,即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三是有序性原则,强调系统的任何联系都是按等级和层次进行的;四是动态原则,即系统的有序联系在发展和变化中进行。^[21]此外,一般系统论还强调系统同周围环境的能量和物质交换,以避免熵增,从而保持系统结构和状态的总体稳定。^①一般系统论的提出突破了当时学者普遍秉持的机械论思维,其理论框架得到了生物学、物理学、工程学等的广泛运用。但是,一般系统论强调系统整体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组成部分的差异性,导致在复杂问题的运用上受到局限。^[22]

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受到了系统论思想的深刻影响。1957年卡普兰(Morton Kaplan)将系统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将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单位组成的系统,认为系统特征由系统中单位的行为和互动模式所决定,并提出六种典型的国际体系模型,包括均势系统、松散双极系统、紧密双极系统、普遍系统、等级系统和单极系统。^[23]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体系视作一个多层次系统,由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组成。世界体系由全球资本主义驱动,中心地区掌握资本、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边缘地区输出资源、劳动力并受到中心地区的剥削,半边缘地区则处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24]辛格(David Singer)的层次分析法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包括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各层次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25]但是,上述提及的国际关系理论均为西方学者提出,运用的往往是简单系统的分析框架,较少考虑系统的复杂性、开放性。

(二) 钱学森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

钱学森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是对一般系统论的发展和深化,吸收了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哈肯(Hermann Haken)的协同学理论。^[26]耗散结构理论解释了复杂系统中有序性产生的原因:系统本身尽管在产生熵,但系统又同时向环境输出熵,向环境输出的熵大于系统内部产生的熵,导致系统保留的熵在减少,所以能够保持平衡、走向有序。协同学理论进一步指出,系统从无序转化为有序的关键,在于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会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非线性作用形成互相协同、自发合作的自组织结构。换言之

^① 熵的概念起源于物理学,用于度量一个热力学系统的无序程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一个封闭系统的熵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系统总是走向无序而非有序。

之,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关键并不在于系统是否平衡,或者离平衡态有多远,而是由于自组织结构。要说明的是,系统间的非线性作用本质上属于不确定性,但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表现为线性特征。开放复杂巨系统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刻画,为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论。

钱学森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程。第一阶段是从简单系统到简单巨系统。简单系统具备整体性和系统性,但组成的子系统比较少,相互关系较为简单。简单巨系统的子系统规模增大,但种类有限,关联关系仍然较为简单,如激光系统。子系统的叠加引起了系统内的层次性,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关联产生了子系统间的网络性,层级和网络的联系又可能产生系统内的嵌套性。^①第二阶段是从简单巨系统到复杂巨系统。复杂巨系统强调系统的复杂性,不仅系统的组成种类繁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错综复杂。巨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也可以被理解为系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于系统要素或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系统的涌现性开始出现,甚至在一定时期呈现出混沌状态。第三阶段是从复杂巨系统到开放复杂巨系统。开放性是复杂性的重要根源,系统与环境的复杂互动是系统复杂性的重要表现。尽管复杂巨系统已经体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但开放复杂巨系统更加强调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例如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环境系统和地理系统等。此外,从系统演化的角度来看,开放复杂巨系统通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内部的自组织,会经过无序、混沌状态演化至更高级、更有序的新阶段。



图1 钱学森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认知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可见,开放复杂巨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整体,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其一,开放复杂巨系统由众多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具有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层次众多、功能综合等特点,同时存在显著的嵌套性。其二,开放复杂巨系统是由系统要素通过非线性关系构成的复杂动态网络,其要素变化可能引发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但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表现为线性关系。其三,开放复杂巨系统强调系统的动态特性与反馈机制,正反馈会强化非线性影响从而带来系统扩张,负反馈则会抑制非线性影响,从而实现短期内的系统稳定。其四,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突出复杂系统的自适应性,认为系统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实现发展和演化,并在特定条件下演化为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是系统经过适应与演化形成的一种高级形态,意味着具有自我进化能力的系统生态的形成。系统生态的形成通常伴随着系统跃迁过程,这也是开放复杂巨系统中会出现而简单系统中缺乏的现象。针对此类问题的解决,钱学森强调使用综合集成方法,即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定性

^① 嵌套性是指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着层次结构的嵌套关系。一个要素可以作为子系统,一个系统也可以作为更大系统的组成要素。这种嵌套关系使得系统或子系统之间形成层次化的结构。

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复杂系统。^[27]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在系统工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其思想不仅为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也从工程、技术、科学扩展到经济、社会、哲学等不同领域,甚至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提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以来,虽然已经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有一定运用,但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并不多见。共建“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区域与国别,关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涵盖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多个主体,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为研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支撑,同时也给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经济外交系统耦合的机制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纲领性的经济外交倡议,其重要意义在于以经济互利促进政治互信,又以政治互信强化经济互利,进而实现经济与外交的正向反馈、良性循环。在这一倡议下,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经济外交政策陆续发布。然而,尽管经济外交一词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其内涵界定却并不完全清晰。狭义上来说,经济外交是任何促进国家经济利益的外交活动,或者是利用经济资源实现特定外交目标的外交行为。^[28]在这一界定下,如果大国仅将经济增长作为推动外交的手段,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大国单边的经济增长将导致双边经济不对称加剧,甚至产生经济胁迫,进而破坏信任关系,损害原定外交目标。广义上,经济外交是一国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职能部门围绕经济事务,针对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者跨国公司展开的官方交往活动。^[29]既涵盖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内容,也包括技术、能源、矿产等具体领域。实践中,有效的经济外交政策离不开对经济运行和外交运行的平衡,包括二者运行的逻辑匹配、取向对接等。

中国特色经济外交追求的是国家之间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政治上的相互尊重,致力于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不断前进。因此,中国特色经济外交是广义上的经济外交而非狭义上的经济外交。鉴于大国经济行为对国际关系的外溢效应,以及外交行为对国内经济的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外交系统可以被界定为其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总和。经济外交系统是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系统能够产生交互影响,在全球、区域、国别、地方等层次的主体间形成网络结构。然而,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的行为主体并不相同。当主体间的行动方向一致,经济外交系统耦合,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会协调一致、协同发展;当主体间的行动方向背离,经济外交系统解耦、分离,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会互不协调、失衡失序,甚至存在互相排斥的可能。^①

(一)经济外交的系统内耦合

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均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交织互动,形成了复杂的结构层次、动态的网络体系。对于外交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划分可以有不同依据,如主体

^① 当两个或以上的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和影响,彼此的行为具有紧密联系性,甚至出现一体化的倾向,我们称之为耦合(coupling)。相反,当系统或子系统之间的依赖状态被打破,系统行为不再受到另一个系统的影响,我们称之为解耦(decoupling)。系统间处于耦合状态或是解耦状态并不存在优劣之分,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维度、功能维度、结构维度、地理维度、时间维度、策略维度等。其中,从主体维度来划分能体现出经济系统、外交系统及其之间相互联系所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也更容易说明经济外交系统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层次性,以便于阐释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耦合机制。具体而言,经济系统是由企业为核心的市场主体主导,外交系统是由政府为核心的权力主体主导,经济外交系统则是由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双轮驱动。权力主体和市场主体是经济外交活动中具有核心决策能力的要素,全面参与政策的提出、制定、执行与调整。这些主体共同构建出一个复杂网络,开展国家间的政策沟通、互动交流和国际合作,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紧密联系的开放复杂巨系统。^[30]当然,由于经济外交系统以主权国家为边界,不同国家的经济外交系统会因地缘条件、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人口规模等因素而存在较大差异。

经济系统是由一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系统的演化遵循着“规模经济—分工经济—模块化”的基本路径。^[31]所谓模块,就是具有某种确定独立功能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经济活动的基础,而长期的相互联系增加了系统复杂性。经济系统的对外合作形式包括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外援助与接受援助,以及国际金融合作等。除对外援助与接受援助以政府为主导外,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均由拥有跨国经营业务或具备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主导。因此,在主体维度上,可以将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划分为生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金融企业等。

生产性企业从事农业、制造业、能源产业等物质产品的生产,通过进出口贸易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通过跨国投资带动技术和资本流动,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服务性企业通过提供物流、法律、咨询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信息和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搭建合作平台等突破了合作障碍、联通了国际市场,通过文化传播、教育培训和旅游开发等增进了各国民众间的理解与信任。金融企业为跨国企业、跨国项目提供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支持,主要金融活动包括银行信贷、证券交易、外汇交易、信用保险等,通过促进资源配置、强化风险管理从而增强了国际经济合作的稳定性。作为经济系统的核心主体,生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和金融企业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才能确保经济活动,特别是国际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例如,生产性企业依赖物流、营销等服务性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依靠金融企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拓宽全球产业链布局。服务性企业通过国际市场的调研和开发为生产性企业提供销售平台,通过引入国际投融资来提升知名度、扩展服务网络、提升数字化能力。金融企业通过服务实体经济来获得收益,借助服务性企业来提升跨境风险管理能力。

外交系统主要由参与外交活动的各类主体构成,其主要功能是拓展对外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外交目标。有学者曾指出,经济外交的主体仍是国家和国家联合体,若无国家主导则不能称之为外交。尽管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主体外交的影响已经日益显著,但政府依然是国际政治互动中具有决策能力的关键角色。具体而言,外交系统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以及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这些外交主体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互相连接、彼此影响的复杂网络。

中央政府是外交系统的核心,既负责制定国家对外战略,又承担推动对外政策落地执行

的职能。在外交议题、领域逐渐多元的背景下,中央政府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整合各主管部门意见,形成兼顾政治性和专业性的外交政策。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参与双边或多边外交事务,推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地方政府是次国家行为体,是经济外交政策落地的关键力量。在经济外交合作中,地方政府通过城市外交、招商引资等途径直接与其他国经济外交系统的主体建立合作关系,并以人文交流夯实国家间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全球性国际组织是制定和推动国际规则与标准的主要行为体,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多边机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防止全球治理失序。区域性国际组织通常专注于区域问题,能够促进成员国深化合作,弥补全球性国际组织在应对局部问题上的局限性。作为外交系统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子系统只有保持在系统耦合状态,才能使国际社会总体处于有序状态。中央政府通过顶层设计为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提供框架与方向,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框架下开展外贸、外事等活动,合作助力国家经济外交目标的达成。中央政府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来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组织则推动主权国家间形成共识、开展合作以应对跨国问题。其中,全球性国际组织聚焦全球层面的规则制定,区域性国际组织侧重解决区域问题,两者需要协调一致、互为补充。

(二)经济外交的系统间耦合

经济外交的系统间耦合是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生产、服务、金融等经济主体,通过与政府、国际组织等外交主体的互动,共同实现经济外交目标的动态过程。经济外交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由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共同构成。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的耦合能促进国际合作,强化行为体之间的互利互惠与政治互信。解耦则可能增加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甚至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因此,从长远角度看,经济外交系统的耦合能够更好地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根据前文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分析,系统间耦合可以分为三种机制:非线性传导机制、反馈机制及适应与演化机制。

第一,非线性传导机制指某一系统的微小变化可能引发另一系统的重大转变。与线性传导机制不同,非线性传导机制意味着系统耦合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不可预测性和非对称性影响。当然,非线性传导机制的结果也可能与线性传导机制一致。^①经济行为对外交系统的影响通常呈现出非线性传导机制。例如,生产性企业的海外投资不仅是一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经济行为,也能够通过增强双边经济联系为政府提供外交杠杆。海外投资不仅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伴随引进技术、创造就业、增加税收、改善民生,进而增加东道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提升母国和东道国的双边关系。然而,当双边关系存在显著的地位不对称时,东道国可能会将外资生产性企业的行为解读为经济扩张或资源殖民,从而导致东道国丧失经济独立性、形成经济依附甚至经济控制,在长期上损害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同样,外交行为对经济系统的影响也会呈现出非线性传导机制。双边关系的改善可能吸引外资快速涌入东道国,

^① 非线性是一个更广泛的类别,包含线性关系。从数学意义上看,非线性关系是指不符合线性关系特征的所有函数,但这并不排除线性关系本身。另外,从开放复杂巨系统由简单系统逐渐演化的路径来看,开放复杂巨系统具备简单系统包含的一切特征,也包括线性传导关系。随着系统的演化,非线性传导关系出现,并且成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但是并不意味着线性传导关系的消失。

以东道国具备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先,继而引发其金融需求的增长。但是,如果东道国的经济政策调控不力,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形成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在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逐利的背景下,这可能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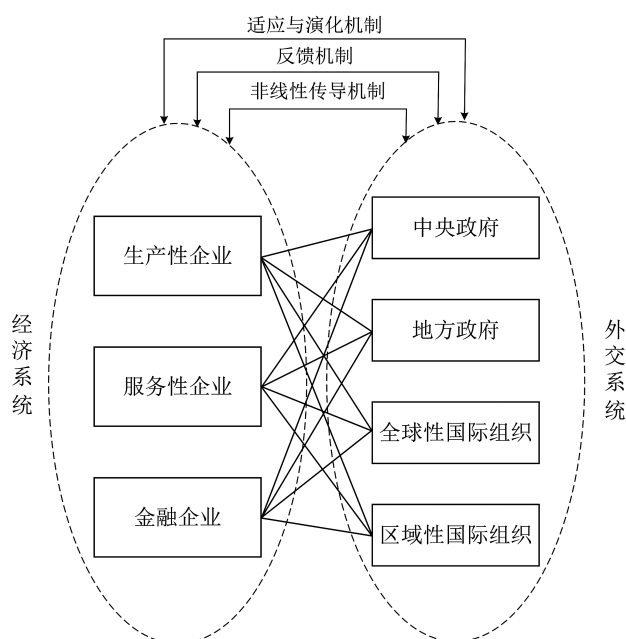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外交的系统间耦合及其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反馈机制是系统动态演化的重要路径,说明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如何通过信息传递和交互行为实现自我调节。反馈机制可以分为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系统的某一变化在与其他系统的互动中被持续放大,推动整个系统向预期的方向扩展并取得系统性突破。在负反馈机制下,系统的某一变化被其他潜在机制抑制,导致系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在平衡状态,但可能在长期上抑制系统的创新与突破。反馈机制广泛体现在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互动中,揭示了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一方面,在正反馈机制下,经济合作推动政治互信,而政治互信进一步刺激经济合作的深化。特别是在区域层次上,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会通过贸易、投资等方式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为外交系统的对话与协作奠定基础,外交活动的开展又为区域内更高效的资源配置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在负反馈机制下,经济竞争易于引发外交关系紧张。一国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如加征关税、提高进口标准等,来维持本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短期内,构筑贸易壁垒或能保障其国家利益,但进口商品成本的上升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长期来看,贸易保护行为会抑制该国的产业创新活力,并对其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适应与演化机制强调系统根据外部环境和其他系统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从而提升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推动系统的升级与演化。就是说,系统之间不仅在静态条件下相互

作用,也会在动态过程中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进行调整与适应。在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的长期互动中,这一机制通过推动两者协同优化,不仅增强了经济外交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还对全球和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经济外交系统既遵循市场规律的运行机制,又对制度性安排高度依赖。单一经济体有限的物质资源和市场规模使得市场主体对国际经济合作提出需求,外交手段则为跨国投资、市场准入、关税协议等关键制度性安排的落地提供支持。其次,经济外交系统的演化并非线性,而是螺旋式发展过程。经济外交合作需要经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对接等阶段,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外交系统跃迁的体现。最后,经济外交系统的演化目标是形成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系统生态。在这种生态中,经济与外交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自主合作和竞争,实现系统的自适应。基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外交系统的适应与演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经济外交的系统间耦合存在三种机制。非线性传导机制放大了系统的微小变化,正反馈机制推动了系统的持续扩张,最终在系统耦合的状态下实现了系统整体的适应与演化,出现形成系统跃迁、系统生态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推动经济外交长期保持在系统耦合状态,那么将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四、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系统及系统耦合

“一带一路”是中国发起的倡议,源自中国,但目标在于推动共建国家共同发展。如前所述,一国的经济外交系统可以被定义为其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总和。“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则由各共建国家的经济外交系统组成,各国的经济外交系统作为子系统嵌套其中。各子系统的外部相互联系,内部的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发生互动,这些内外因素都影响着整体上“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的运转。随着共建国家增多,“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的边界又在不断拓宽。

从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实践可以看到,这一倡议推动了国家间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也受益于国家内经济外交系统耦合。国家间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是国家间经济系统和国家间外交系统各自主导的,但国家间的经济系统耦合或者国家间的外交系统耦合并不意味着整体上国家间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这是因为,国家间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还需要各国国内的经济外交系统耦合。以A国和B国的经济外交系统为例,如果A国推动与B国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但合作目标或合作结果无法获得B国的国内政治认同,B国的经济外交系统处于解耦状态,那么B国的外交系统将无法与A国的外交系统耦合,A国与B国无法产生经济外交系统耦合。同样,如果A国与B国的外交关系改善,但B国的外交政策并不能够影响国内经济系统的行为主体,或者B国并不具备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能力,那么B国的经济系统将无法与A国的经济系统耦合,导致A国与B国无法产生经济外交系统耦合。

实践中,共建“一带一路”在区域与国别层次上取得的成效不尽相同。根据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通过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作为共识基础。因此,这种成效差异并不来自国家间经济外交关系的区别,而应归因于不

同区域、不同国别内部经济外交系统耦合的差异。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成效最为显著,东盟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示范区。^[32]2019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又超越欧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外交合作为案例,能够更为直观地呈现出区域与国别层次上经济外交的系统耦合机制。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合作驱动了中国同东盟各国之间的双边外交关系,又以双边关系带动了中国同东盟整体的多边外交关系。其次,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协调发展,带动了中国—东盟经济外交系统的良性运转,进一步保障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最后,中国—东盟经济外交系统经过一系列的适应与演化,实现了系统跃迁,形成了具有自适应性和自我进化能力的系统生态。

(一)经济系统驱动经济外交系统耦合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平台,为经济系统带动外交系统运转创造了合适的场域。在非线性传导机制下,经济合作产生的连锁反应推动了外交关系的多层次发展。不仅强化了双边关系,也促进了区域合作机制的优化。

生产性企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产能合作等破解了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激发了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动能。老挝位于东盟区域的交通枢纽,但长期以来因交通基础设施的短缺限制了其经济发展。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超过16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4.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在铁路建设方面的能力为“高铁外交”创造可能。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合作项目,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投资控股、与老挝合资成立的老中铁路公司承建,于2021年12月3日正式通车。中老铁路改善了老挝的交通条件,更带动老挝11万人就业,改善了民生水平。从外交影响来看,中老铁路不仅象征着中国和老挝关系的密切发展,还在东盟区域发挥了示范效应,特别是加强了与泰国的联系。目前,中泰铁路项目全线首座连续梁已完成合龙,预计联通后将形成贯通泰国、老挝和中国的铁路动脉,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多边外交关系。

服务性企业通过提供物流、通信、科技、咨询、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等服务,对外交系统产生了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东盟是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东盟国家的共同诉求,中国也一直支持东盟的数字化转型。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全球前列,特别是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优势较大,有能力为东盟国家提供数字服务。^[33]企业层面,阿里巴巴、滴滴等科技公司通过与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平台合作,联合推出Lazada、Grab等产品,不仅提升了区域内数字经济水平,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民间外交。在 market 需求的推动下,东盟的数字治理水平快速提升。泰国和印尼先后出台《个人数据保护法》,推动了东盟数字治理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在数字经济合作的纽带下,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更为紧密的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与中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如《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和《2022年中国—东盟数字合作计划》。^[34]

金融企业通过促进资本流动、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一带一路”项目,是驱动经济外交系统耦合的重要力量。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合作建立在实体经济密切联系的基础

上。目前,中资银行已经实现了在东盟10国的全覆盖,东盟国家有超过110家金融机构成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参与者,中资银行推出泰铢、菲律宾比索、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越南盾、印度尼西亚卢比、柬埔寨瑞尔、老挝基普、缅甸元、文莱元等10个东盟国家货币的银行柜台挂牌交易业务。由于人民币直接兑换交易的增多,部分东盟国家主动调整了本国经济系统内的金融政策。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柬埔寨和菲律宾等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与中国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其中,新加坡金管局常态化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是香港之外与内地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最高的国家,2022年、2023年均占收付总量近10%。双边货币从结算、储备到互换,是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密切的体现,也夯实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二)外交系统保障经济外交系统耦合

外交系统是保障经济系统平稳运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正反馈机制下,外交行为通过增强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的协同发展,也同时巩固了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合作。

在早期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中国政府通过推动中老铁路、金港高速公路和雅万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协议的签署等,确保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地区的落地实施。中国—东盟经济系统的合作成果在外交系统中得到反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实现平等、互惠,“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耦合不再仅由中国政府主导。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明确将“一带一路”建设列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重点,包括中新互联互通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对华事务委员会成立了“一带一路”中心,帮助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了解“一带一路”相关经贸投资政策。柬埔寨主动将“2015~2025工业发展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与中国共同编制柬埔寨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耦合需要发挥主体力量,地方政府是外交系统中负责政策实施的重要主体。东盟10国中有老挝、缅甸、越南三个国家与中国接壤。广西与越南接壤,云南则与越南、缅甸和老挝三个国家接壤。以广西为例,这一中国华南省份已经成为落实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政策的关键力量,推动双方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机制。国别层次上,中国—东盟博览会由广西承办,迄今已举办21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搭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东盟市场的双向开放。中国连续15年稳居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也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城市层次上,广西与吉隆坡、雅加达、曼谷等城市在规划建设、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密切对接,在农业、科技、环保、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诸多项目合作。领域层面,广西的南宁东盟商务区和区域性跨境人民币业务平台(南宁)等,也是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

经济外交系统具有开放性,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同东盟的对接需要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支持。联合国将“一带一路”视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成为首个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际组织。“一带一

路”项目在东盟地区的实施也得到了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支持。柬埔寨甘再水电站是中国电建在海外投资开发的第一个BOT水电站项目,旨在以绿色清洁能源支持柬埔寨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联合国于2023年为该项目核签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碳减排量,帮助其实现碳减排收益的落地。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也为“一带一路”在东盟的项目提供政策建议和融资支持。IMF定期发布《区域经济展望》,跟踪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投融资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的运转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东盟秘书处作为东盟的主要行政和政策支持机构,通过促进政策对话、推动区域合作项目、沟通多边协议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等,在推动东盟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对接中发挥了协调作用,如每年举行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实施,推动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等。中国—东盟中心是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立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合作。中国—东盟中心参与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在中国各省区市举办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推介会,为企业层面的中国—东盟合作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经济外交系统的系统跃迁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在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地缘政治格局调整时,中国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外交政策以适应变局,进而带动经济外交系统的整体性演化。特别是在正反馈机制不断累积的情况下,系统的适应与演化会带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整体跃迁至下一阶段,形成具备自我进化能力的系统生态。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行为取决于权力和利益。由于大国和周边小国存在经济、资源等方面的不对称结构,大国会利用其优势地位来压制和控制小国,产生“霸权”行为。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东盟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难免心存疑虑。对此,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消除东盟国家的顾虑。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味着东道国与母国之间摒弃不对称关系,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模式又要求主体遵循互惠互利的商业逻辑。中国推动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合作,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建立数十个海外产业园区,覆盖加工制造、热带农业、资源利用、商贸物流及科技研发等多种类型,同新加坡以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推广并复制苏州工业园的运行模式。

在国际关系中,适应与演化的高级形态是构建制度保障下的系统生态。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东盟合作构建了良性循环的系统生态,驱动了区域经济外交系统的系统跃迁。中国和东盟作为拥有14亿多和6亿多人口的两大市场,总人口规模占全世界的1/4,市场资源是双方最突出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一年,由东盟10国发起、5个伙伴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开始第一轮谈判,并于2022年1月正式生效。在正反馈机制下,“一带一路”通过多种渠道加快区域经济建设,也加快了RCEP进程。RCEP在区域范围内整合了伙伴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扩大了彼此间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推动了“一带一路”在区域内的建设进程。换言之,由于政府主体的交叉重叠,“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系统与RCEP的经济外交系统之间也发生了系统耦合。RCEP既是经济

外交系统耦合的自然结果,又促进了区域经济外交系统的正向演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革新。^[35]与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同,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以东盟为中心、由东盟来主导,中国仅是重要的推动国家。目前,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智利已经提出加入申请,孟加拉国提出加入RCEP的考虑。2024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3.0版升级涵盖数字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9个领域,在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方面的工作重点同共建“一带一路”高度契合。总之,共建“一带一路”为RCEP的签署和扩容奠定了坚实基础,RCEP也在演进中逐渐形成与“一带一路”的系统耦合。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推动国际社会的“去中心化”进程,通过互联互通实践使每个国家成为“自中心”,增强全球经济发展动能,破解国际社会的信任稀缺困境,形成“节点—网格”化的国际秩序。^[36]

五、结语

作为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典型案例。这既需要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也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相互转化。^{[37][38]}通过生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和金融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促进了共建国家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等权力主体的外交互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得以具象化。这种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双向互动,不仅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中的认可和支持,也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力。然而,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外交系统的良性运转,还依赖于各国内部经济系统和外交系统的统筹推进、协同发展。对此,本文从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出发予以剖析。

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融合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西方学界的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理论等。这一理论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也有极强的运用前景。共建“一带一路”涉及的主体多元、领域众多,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基于这一理论,可以有效阐释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经济系统与外交系统的系统耦合过程,包括系统内耦合和系统间耦合。“一带一路”的系统耦合可以分解为非线性传导机制、反馈机制和适应与演化机制。基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到,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经济外交的系统耦合,也受益于经济外交的系统耦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这种机制的完善不仅在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也要在理论创建上进行优化和演进。总之,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为“一带一路”的理论构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分析视角与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 [1] 吴泽林. 解析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能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7(11): 35-64.
- [2] Broz J L, Zhang Z and Wang G. Explaining Foreign Support for China'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3, 2020, pp.417-452.
- [3] Wang C, et al. Railway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Estimating the Impact

-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Vol.134, 2020, pp.288-307.
- [4] 吕江,张可.“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制度建构:发展历程、中国贡献与路径抉择[J]. *东北亚论坛*, 2024 (2): 34-46.
- [5] Adekoya O B, et al. China'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BRI Countries [J]. *Energy Policy*, Vol.182, 2023, p.113740.
- [6] 欧阳康. 全球治理变局中的“一带一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8): 5-16.
- [7] 孙壮志. 元首外交引领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J]. *当代世界*, 2022(12): 33-37.
- [8] Yu 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J]. *Asia Policy*, Vol.24, No.1, 2017, pp.117-122.
- [9] Leslie A N. China-Africa Re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J].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19, No.3-4, 2020, pp.1-7.
- [10] Liu W, Dunford M and Gao B.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Vol.28, No.9, 2018, pp.1199-1214.
- [11] Lin J Y.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ationale and Likely Impacts of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Vol.5, No.2, 2022, pp.259-265.
- [12] 佟家栋.“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超越[J]. *经济研究*, 2017(12): 22-25.
- [13] 韩剑,王灿.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FTA深度作用的考察[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2): 54-67.
- [14] 赵磊,张晗. 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理论认知与实践效应[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 (5): 45-55.
- [15] 马涛,陈曦.“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4): 131-154.
- [16] Nordin A H M and Weissmann M. Will 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2, 2018, pp.231-249.
- [17] Zhang E and James P. All Roads Lead to Beijing: Systemism,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 No.1, 2023, pp.18-44.
- [18] 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6(3): 1-24.
- [19] 黄凤志,谭桂照.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与“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经济蕴意[J]. *东北亚论坛*, 2021 (6): 59-78.
- [20] 王兴成. 系统方法初探[J]. *哲学研究*, 1980(6): 35-42.
- [21] Von Bertalanffy L.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General Systems Theor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15, No.4, 1972, pp.407-426.
- [22] 钱学森,等. 论系统工程[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289.
- [23] Kaplan M.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pp.4-6.
- [2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M]. 罗荣渠,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3-12.
- [25] Singer J D.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World Politics*, Vol.14, No.1, 1961, pp.77-92.

- [26]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3-10.
- [27] 于景元.一代宗师百年难遇——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成就[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S1):1-7.
- [28] 赵可金.经济外交的兴起:内涵、机制与趋势[J].教学与研究,2011(1):56-62.
- [29] 李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逻辑[J].当代世界,2018(6):22-26.
- [30] 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9):145-154.
- [31] 胡晓鹏.从分工到模块化:经济系统演进的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4(9):5-11.
- [32] 翟崑.“全球南方”与经济全球化的合力:以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为例[J].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3):71-80.
- [33] 许翔宇,杜雨珊,许培源.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水平及潜力研究[J].亚太经济,2023(2):34-45.
- [34] 杨耀源.东盟数字经济共同体构建的进展及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24(10):92-113.
- [35] 杨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革新与探索——以RCEP的构建为例[J].国际经贸探索,2020(12):67-81.
- [36]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3):114-121.
- [37] 门洪华.“一带一路”与中国—世界互动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5):4-21.
- [38] 李向阳.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理念、组织机制与实施机制——兼论“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属性[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3):4-30.

[责任编辑 许佳]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anction : A Research Framework

FU Jing-yun ZHANG Yu-yan · 3 ·

Abstract: As the game between major powers intensifies, international san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a country to project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to the world. The cor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 include the concept and motivation of sanctio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sanction,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sanction, the timing of sanc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 They influenc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unified and complete sancti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ect evaluation. The setting of sanction target is the basis for selecting the corresponding sanction types, while the timing and sequence of sanction determin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effectiveness boundary of sanc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 is not determined unilaterally by the sanctioning country.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sanction and counter-sanction grea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sanc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and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sanction, especially to track the latest progres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 and strive to extract propositions related to sanction, thereby triggering further thinking on san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anction; Motivation of Sanction; Sanction Time; Effectiveness of Sanction; Great Power Gam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Survival Strategic for Frontier Pivot States in the Regional Bipolar Pattern

QIN Li-zhi FU Teng-hao · 22 ·

Abstract: In the regional bipolar pattern, so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possess special strategic value. They are located at key positions for neighboring major powers to achieve defense or strategic expan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rve as the frontier pivot for more distant major powers to achieve strategic deterrence and political infiltration. In existing research, hedging strategy has almost become the main mea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to fac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major powers. However, relevant research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common sense of strategic uncertain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risk avoidance is not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rational choice, nor is it the best means to escape from a dilemm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able mechanisms and the tracking of case process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upport and the urgency of th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can provide a preliminary explanation for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Exter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to adopt a strong or weak strategy, and on this basis, the urgency of the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further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fluencing the state's choice between conservatism and aggressiveness. Currently, the trend of bipolarity and confrontation in some regional system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evident. The exploration of related issues not only helps to identify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ut also provides beneficial insights into China's assessment of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related regions.

Key Words: Bipolar Structure; Intermediate Zon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Hedging Strategy; counterbalancing; Appeasement; Neoclassical Realism

System Coupling of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operation : An Analysis Based on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

ZHANG Han ZHAO Lei · 45 ·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achieved historic milestones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has facilitated mut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while enhancing political trust and fostering consensus. Utilizing Qian Xuesen's theory of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economic systems, diplomatic systems, and their inter-system coupling is beneficial for solidif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BRI. Case studies reveal that the BRI has facilitated the systemic coupling of economic diplomacy, encompassing both intra-system and inter-system coupling. Among them, under the nonlinear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 chain reaction generated by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promoted the multi-level develop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under the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diplomatic behavior has enhanced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s, the BRI cooperation has gradually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ecology based on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has pushed forward the formation of a self-organizing structure of mutual synergy and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intra-system and inter-system coupling of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the concepts of integrated promotion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ursue steady and sustained progress in high-quality BRI cooperation.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Diplomacy; System Theory;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s; System Coupling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LIU Xue-lian TANG Xin-yu · 61 ·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has become a prominent reality in the world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 changes and existing studies,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manifested in both practice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tc. is deeply influencing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has multiple meanings for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has driven the "global turn" in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ories, helping to break through Western-centris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luralistic